



傅仲杰小时候居住在外婆家，与外婆、舅舅、表哥的合影。

变革光华下的园丁笑颜

1977年，恢复高考的消息令人振奋。从这个时间节点开始，人们对读书、学知识开始重视起来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，令班级与班级、学校与学校之间的竞争开始大了起来。于是，教授物理、化学的父亲，开启了全新的教育生涯。由于教学压力增大，他平时会选择住在学校的宿舍，于是我们见面的机会又开始少了。

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：“上的课，一定要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听懂。”这句话听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却很难。我记得，他曾经熬夜在灯下备课，并且翻阅大量的资料去完成一份习题，有时候，还需要尝试做一些新题来帮助学生们应对难度大幅度提高的考试。周末的时候，他会带着我一起去新华书店买一些习题资料，返回家继续研究。

1980年，他转到精忠中学教书。2000年，精忠中学与云城中学合并，更名为耕民中学。在这段漫长的时间中，他带了数不清的学生离开初中，有50多人考入慈溪中学，却极少有时间好好坐下来辅导我的理科作业；他一点点变老了，我一天天长大。在耳濡目染之下，我考入锦堂师范，毕业后成了一名小学教师。

改革开放前后，对父亲来说，同样是累，意义却分明不同。之前，是与时代的不妥协；之后，则是尽情挥洒汗水。

从“大时代”的角度来说，他发现学生们对于科学技术的渴求度正在变高，知识开始变得沉甸甸、有分量。这对一个老师来说，是莫大的鼓励。而从“小个人”的角度来说，父亲觉得教师这份职业终于受到了社会的认可。这份来之不易的认可既体现在人们的言谈举止中，也渗透在存折里——工资开始局部地拔高，社会福利也得到了保障。

抹不去的“刺青”与“烙印”

我的妻子也是一名教师。结婚几年之后，我带着父母与妻儿一家5口，从周巷搬到了浒山。当时，我正在周巷镇第二小学任数学老师，已经有13年的教龄；而父亲，则光荣地退休了。离开学校的那天，我分明看到，他的脸上带着一丝黯然神伤，双鬓记录着冗长岁月留下的花白。

那首声嘶力竭跨越时代的教坛之歌，也终于落下了最后一个休止符。

从那天开始，我看到了一个与之前有些不一样的父亲。他坐不住，喜欢四处走走。他不仅去过境内外十几个城市，还保持每天早上绕着城市慢走锻炼的习惯，与之前将大部分时间花在教学上完全不一样。或许，对他来说，这也是一种挥别34年教育生涯的方式。

阔别，只需要张开手掌轻轻摇动；而时光巨轮在父亲身上留下的刺青，却难以抹去。从小到大，父亲虽然没有一板一眼地对我说过：“仲杰啊，你应该……”这样的话，但早已在我心中轧下了一个又一个烙印。

最大的印记，便是他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。哪怕生活变得越来越好，我也不会乱花一分钱。要知道，那时父亲为了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好一点点，使出了九牛二虎之力。还有一点，就是教书育人时的那股子认真劲儿。在教育竞争愈发激烈的今天，优等生往往更能吸引老师的眼球，但我总是记得父亲说过的：“上的课，一定要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听懂。”

如今，我家有4名教师。而我也逐渐发现，生于1972年，成为一名人民教师，绝对是人生中平淡又幸福的事情。这样的际遇避开了所有的飞沙走石，看到的全是人间开花的曼妙场景。而在这之前，是父亲摸着黑披荆斩棘为我开了路。



傅仲杰与父亲傅年余同框的照片。